

懷念杭立武先生

● 王作榮（考選部部长）

三次見面印象深刻

我第一次見到杭立武先生，是在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八、九月為同學王福杰向教育部（南京成賢街）辦理自費留學手續時，因為教育部將他的名字漏掉了，核准留學證書始終發不下來，而船期與學校開學期又已逼近，我迫不得已，祇好自己拿著公文，從承辦人員開始而科長、而司長、而次長、一關一關的去撞。因為錯在教育部，我理直氣壯的在各級官員的辦公桌旁或辦公室外，等著立即簽字過關。最後一關便是政務次長杭立武先生，我等在辦公室外，公文送進去不到十分鐘，杭先生便親自拿著批好的公文在室外交給我，態度十分和藹，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。迄今回憶，猶歷歷如在眼前。我拿著批好的公文去辦理登記、繕寫、填寫證書、用印、發文，從早到晚，一天辦完，效率奇高。

我第二次見到杭先生，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，地點是圓山飯店（台灣台北市）大廳，那時杭先生是教育部長，而我則是急於要謀求一枝之棲以維持一家九口生活的流亡者。由我的老師、

杭先生的兒時好友張慶楨先生介紹我去見他，杭先生立予接見，略談數語，便表示想辦法。隨後我就應聘到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擔任副教授。學校當局並出示教育廳長陳雪屏先生的一張便條，上面寫著奉部長諭，聘某某人為某校某職。杭先生於接見過我後，立即飛回大陸，我連道謝函都沒寫；政府遷台不久，杭先生便辭去了教育部長職務，未見發表新職。

第三次見到杭先生應該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、九月，杭先生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，我則在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擔任顧問。一天下午，忽然接到一通電話，報過姓名後，說要來看我，我在電話中將杭先生的大名聽成我的一位朋友郝先生，便回答說，我現在在辦公室等你，請你馬上就來，連一句客氣話都沒說。約半小時後，杭先生敲門而入，我立即發現了我的錯誤與失禮，向杭先生反覆致歉，說是我應該去看他，實在是聽錯了，怎麼也不會想到杭先生會來電話要來看我。杭先生當即說明來意，要在國研所成立二個臨時性的研究小組，一為經濟，一為外交，想請我以特約研究員名義參加經濟組，我當

然欣然同意。
以上是我三次面見杭先生的經過，每次見面皆有深刻的印象。

不計名位為國效命

遠在民國四十二、三年，杭先生正在用英文撰寫一本向國際社會介紹自由中國經濟狀況的書，幾次寫信來向尹仲容先生要資料，尹先生交給我辦，我見到是杭先生要資料，便很快的整理了一套資料寄去。以後除來信道謝外，還陸續要了一些資料去，其目的當然是在運用杭先生本人在國際社會的聲望，為中華民國作國民外交。這是我為杭先生服務的開始，不過杭先生當然不知道是我在為他收集資料，這是一件極小的事，但可看出杭先生愛國家及不計名位為國家效命的精神。

民國五十六年初，我去設在泰國曼谷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，擔任工業研究組組長的職務。其時杭先生已從駐泰大使轉任駐菲律賓大使有二年半之久，但是無論是僑界、聯合國駐泰機構的中國人，以及甚至泰國政府高級官



①杭立武講演時的神情。

②杭立武1986年與立委張慶楨（左）等合影。



員，可說是「逢人便說杭先生」。對杭先生是一片讚美之聲，懷念之情。其得人之衆與受尊敬愛戴之深，在我所見到的許多偉大人物中，實為極少數，而杭先生所憑藉的，不過是「助人以誠，待人以禮，與報國以忠」等幾項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立身處世守則信條而已。我對杭先生的印象之深，仰慕之切，便是從此時開始。

民國五十九年初，我奉蔣經國先生之召返國任職，機緣錯失，在經合會備位閒員，杭先生不恥下顧，親來我的辦公室看我，邀我參加國際關係研究所經濟組，擔任特約研究員，我基於對杭先生的景仰，便欣然應命。杭先生也是應蔣經國先生的邀請返國任職，而返國以後始終未能給予發展抱負機會的一位人士，屈就一個外界對之「妾身未明」的「研究」機構的主任，但杭先生從未有絲毫屈就之色，立即全力投入工作，展開新局。

政策建言多被採納

杭先生於接任專職時，正值我國退出聯合國不久，繼之以中日斷交及隨之而來的一片斷交聲，國勢飄搖，也正是仁人志士志切報國的時機。杭先生審時度勢，深知外交與經濟發展為中華民國生死存亡之所託，立即在國研所的正常組織架構之外，成立外交與經濟兩個臨時性的編組，從事研究外交與經濟的工作，向政府當局——蔣經國先生——作政策性的建言。外交組由周書楷先生領隊，並代表外交組參加經濟組的討論會。經濟組由我擔任服務工作，並代表經濟組參加外交組的

討論會。當時參加經濟組的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有李登輝、劉大中、蔣碩傑、邢慕寰、郭婉容、孫震、梁國樹、歐陽勛、陳昭南、張繼正、李洪鰲、陳元諧先生。劉大中、蔣碩傑兩先生身在海外，不常參加會議，邢慕寰先生不久即去香港中文大學任教，歐陽勛先生係後來加入，張繼正與李洪鰲先生分別代表經合會與行政院秘書處，陳元先生代表國研所。這一份名單已將當時國內外的經濟學界菁英網羅殆盡，聲勢甚壯，常邀請政府機關有關人士列席說明實況，大都能應邀而來。中油總經理胡新南先生曾說過一句話：「看到這份名單，還能不爽」。

當時正值國際石油價格及國內物價飛漲之際，經濟問題多而嚴重。經濟組每兩週開會一次，每次開會時擬定下一次會議討論題目，並就各人專長推請一人收集有關資料及執筆寫背景報告，以便在會議中作詳細討論，然後就討論內容綜合後作成結論，並提出建議，送交杭先生，轉送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作為決策參考。據杭先生告知：「因蔣院長注意力在財經方面，他對這方面的建議經常欣然接受，有時還要我親自送去同他討論。兩年多以後，他曾向我表示採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建議。」（參閱「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」第六十三頁）。

精神感召樂於奔走

每次討論時均由杭先生親自主持，但不表示意見，王愷先生擔任連絡及作紀錄工作。在會議中各人發言十分熱烈，時常爭持不下，由我作溝

通協調工作，最後均可得到較為一致，但卻不違背學理，不離開現實，切實可行之政策建議，最後報告或由撰寫背景資料人執筆撰寫，經我調整以兼顧不同意見之納入，並作文字潤飾，或直接由我執筆撰寫。杭先生對於每次報告均感滿意，如前所引訪問紀錄，蔣經國院長亦十分滿意。

經濟、外交兩組平均每週有一報告呈報蔣院長，周書楷先生曾一再告訴我，說他曾反覆向杭先生建議，報告太多，恐將引起政府有關部門反彈，出而阻擾，不妨每月或更長時間寫一次報告，我也曾將此意向杭先生表達，均未蒙採納。其中尤以經濟組儼然形成另一決策參謀單位，與政府決策部門遙遙相抗，使得當時財經大員惴惴不安，一再刺探報告內容或索取報告副本，杭先生均加婉拒。最後延請經合會秘書長張繼正先生參加經濟組，同時接納行政院秘書處組長李洪鰲先生列席，作為緩衝。但仍然「引起各部會若干人員的不滿，以為國際關係研究所干涉各部會的業務，屢次在行政院會議上抨擊國際關係研究所。最後，經國先生對這些批評並不在意，他認為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經濟、外交兩小組自成立以來，對國事建樹良多，但是為了各部會的和諧相處，經國先生就向我表示不必再研討國內政經事物，而專心於大陸研究，我因此建議將國際關係研究所改隸政治大學。我也結束經濟、外交兩小組業務，辭卸研究所主任。」（參閱前引訪問紀錄第六十四頁）。

國研所於六十四年七月改組，經濟組成員據說還被續聘了一段時間，我是唯一立即即被解聘



①

①杭立武博士（左）與本文作者合影。

②作者王作榮（左）與余紀忠（中）周書楷（右二）李國鼎（右）等合影。



②

的一位，這叫做樹大招風，亦可見當局者對我防範之嚴密。

我在經濟組所擔任的工作非常沉重，而且還要代表經濟組參加外交組，每週均要去國研所開會，又無交通工具，須周書楷先生的車接我，曾一再向杭先生請辭，或建議改為每月寫一次報告，均未得到杭先生的同意。將近三年的時間，經

常接近杭先生，對杭先生的熱愛國家，忠於職守，不計名位，全心全力做好工作，完成任務，以及無偏無私，用人唯才，提攜獎掖後進惟恐不及的精神，都有深入的了解，益增敬佩之忱，因而也就心甘情願的願為杭先生效力。我是一個不太容易接受別人影響的人，杭先生對我確實發生了「精神感召」的作用。



杭立武先生早年的照相。

無偏無私 堅毅果決

而杭先生對我也有較深的認識，幾乎是「從此逢人說項斯」，政府每有人事更動，杭先生常在暗中推荐。有時則徵詢我的意見，我知道大勢所在，都予婉謝。我一生有好多貴人都在為我的出路前途著急及幫忙，其中最突出的有兩位：一是余紀忠先生，一是杭立武先生，他們之推荐我，可說是屢荐屢敗，屢敗屢荐，而且都是事先不告知我，杭先生則連事後也不告知我。杭先生由於推荐不成，便在他自己所創設的機構中安置我，如人權協會及港澳之友會，我都擔任常務理事，還有國內外的會議，也邀我參加，還指定要我發言，這當然是在鼓勵我，推介我，惟恐我意志消沉，埋沒了「人才」。有一度並有意安排我在他退休後接他主持人權協會。可惜我的長處不在此，始終沒有積極投入，也就沒有什麼貢獻，辜負了他的期望，慚愧之至。

我在杭先生病重時曾去中心診所探望，杭先生握著我的手，面對護士小姐，很困難的大聲說出二句話：「好朋友，他是人才。」知遇之恩，永生不忘。

杭先生是中國社會新舊交替中所產生的典型人物，一如其他在這一段期間傑出的人物，兼有中西文化教養與新舊知識之長，立身則溫柔敦厚，忠信誠篤，學問則貫連中西，運用自如；行事則無偏私，堅毅果決，而其愛國愛人，為國家社會貢獻自己的一切，則至死方休，為他的國家，為他的人民，不計名位，不論得失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令人不勝感念崇佩之至。

②一九八八年杭立武（右三）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時留影，中為行政院長俞國華。

①一九五四年蔣中正總統偕夫人宋美齡（右二、右三）與杭立武（右一）及杭夫人（左三）合影。

